

C01

清代中叶的白莲教起义

历史知识读物
清代中叶的白莲教起义

夏 家 骏

范 曾 插画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人民路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外文印刷厂印装

787×1092毫米1/32 1³/₄印张 26千字

1974年7月第1版 1974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018·649 定价: 0.12元



527.5

1037

知识读物

0.50

毛主席语录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香港公共图书馆 HKPL



3 3288 06443861 9

C111.151
HRC

历史知识读物

清代中叶的白莲教起义

夏 家 骏

中 华 书 局

1974 年 • 北京

目 录

一 阶级矛盾的尖锐化.....	1
二 白莲教组织的川、陕、楚大起义	7
(一) 白莲教的一般概况	7
(二) 川、陕、楚大起义的导火线	10
(三) 烈火燃烧	12
(四) 所向披靡	14
(五) 人民起义的威力	23
(六) 坚贞不屈的女英雄	25
(七) 扑不灭的烈焰	30
(八) 惊心动魄的战斗	33
(九) 艰苦卓绝的斗争	40
(十) 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44
三 结束的话	47

在湖北、四川、陕西三省交界的辽阔的大地上,长江、汉水奔腾而过,两岸崇山峻立,森林如海。这里是广袤〔mào 茂〕千里的南山老林和巴山老林^①。

十八世纪末,被地主阶级压榨、摧残得无法再活下去的几十万农民、手工业者,在这里举起了“官逼民变”的大旗,纵横转战在深山老林之间,极其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者,使清王朝一蹶不振,从所谓的“隆盛之世”,急速地坠入了没落的深渊。

这场历时九年、波及五省、成为清朝封建统治由“盛”到衰转折点的农民革命战争,就是清代中叶著名的川、陕、楚白莲教大起义。

一 阶级矛盾的尖锐化

清朝是我国封建社会里的最后一个王朝,它是以

^① 从陕西南部的略阳、凤县向东,经宝鸡、洋县、宁陕、镇安、山阳等地到湖北西北部的郧〔yún〕西一带是南山老林;从陕西南部的宁羌(今宁强)、褒城向东南,经四川东北部的南江、通江、开县、巫山、陕西南部的紫阳、安康,直到湖北西北部的竹山、房县、保康一带,叫巴山老林。

满族贵族为首的、包括汉族地主和其他各族上层分子在内的地主阶级政权。它对各族人民进行骇人听闻的军事镇压、政治控制和经济剥削。清朝中叶以后,封建生产关系的腐朽和上层建筑的黑暗已经暴露无遗,日益成为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的桎梏〔gù〕,全国人民过着暗无天日的痛苦生活。

封建社会里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这时已经绝大部分被皇室、满族贵族和汉族地主抢占了。十七世纪末以来,皇室和由封建国家直接控制的“官田”已占全国耕地面积的七分之一,达到八千万亩以上。就是一般的地主,也都普遍拥有千亩以上的土地。乾隆年间(1736—1795年),浙江奉化一家姓黄的地主竟占有几十万亩好田;河北怀柔的大地主郝氏更霸占了良田一百万亩!大商人及其他高利贷者在兼并土地方面也不甘落后,他们一听到何处受灾,便闻风而至,乘人之危,大放其债,把麦收在望的大片田地强占到手。

在疯狂掠夺土地的同时,统治阶级还拼命加捐派税,以满足他们无穷的贪欲和维持庞大的军队。康熙(1662—1722年)末年以后,除正税以外,还有各种名目的加派,花样百出,贫苦人民的负担越来越重。各级政权又乘机层层加码,贪污成风。当时流传着“三年清

知府^①,十万雪花银”的说法:当三年知府官,就能捞上十万两白花花的银子,这还算是所谓的“清官”!乾隆时的大官僚和坤更是一个聚敛能手,他当政二十年,除占地八十万亩外,家产还折合白银八亿两,相当于当时清政府二十年的财政收入。防治黄河水患的官员,为了便于营私舞弊、克扣公款,竟多次丧心病狂地故意掘损河堤,造成水灾。人民极其痛恨这些贪官污吏,把他们形象地比作吃人害命的老虎、无孔不钻的大耗子。

为了维护地主阶级肆无忌惮的经济剥削,清朝统治者还凭借封建国家机器,对各族人民实行了残酷的政治压迫。皇帝规定那些被派到各省区作最高长官的总督、巡抚们的“第一要务”,就是“诘(追究)奸缉(逮捕)匪”,这里所说的“奸”、“匪”,正是广大备受凌辱剥削、被迫起来造反的劳动人民。为了达到这个罪恶目的,清政府豢〔huàn〕养了大批反动军队,分驻全国各地,进行监视、镇压。这些清军在地方上无恶不作,奸淫掳掠、霸占民房,甚至白天抢劫,连统治者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军队使“地方受害,甚于‘盗’‘贼’”。乾隆一代,清朝政府依靠这批鹰犬曾先后镇压了台湾、甘肃、湖

^① 清代,府是省下一级的行政单位,辖数州(散州)县。一府的最高行政长官称“知府”。

南、贵州等地人民的起义斗争。此外,在清朝的法律中还制订了各种对付人民反抗的酷刑,如凌迟^①、梟〔xiāo 消〕首^②、戮尸、灭族等,连欠租缓交、所谓“欺慢田主”的贫苦农民,也规定要挨八十大板。当时人民的生命毫无保障,在乾隆皇帝一次南巡的途中,侍卫站在龙舟上,张弓一箭,就把岸上一个正在做晚饭的妇女射死了。在封建专制主义的淫威下,有多少象这个妇女一样无辜的牺牲者啊!

清朝统治阶级依靠国家政权,对广大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江苏泰兴有一个姓季的大地主,夏天晾皮衣服,光是掉在晒场上的毛就有三寸厚。京城北京的一个大粮商祝氏“富逾(超过)王侯”,他盖了一千多间大屋子,还有一个大花园,里面亭台楼阁,色色俱全,穷极奢华。至于那地主阶级的总头子——清朝皇帝骄奢淫逸的程度就更是难以想象了。有一年,乾隆皇帝给他母亲做寿,各地就献上了上万个千姿百态、形状不一的小金佛。1777年,乾隆为了装他母亲的几根烂头发,又耗费黄金三千多两造了一个“金发塔”!

封建社会是地主阶级的天堂,而社会财富的创造

① 一种分割犯人肢体的死刑。

② 把犯人的头砍下来挂在高处示众。

者——广大劳动人民却终年挣扎在死亡线上。当时是“富者一而贫者百”,在“赋外加赋”、“差外加差”的盘剥压榨下,农民纷纷失去土地,只好去当地主的佃户,遭受沉重的地租剥削。清朝中叶,以江西南昌为例,佃农每亩地要交租二石一斗,比清初又上涨了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一百。正租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种加租。驴打滚的高利贷利率也高得惊人,滚来滚去,不到一年就“利过于本”。每当腊月,地主就派遣“悍仆豪奴,分头四出,如虎如狼,逼取租债”,甚至私设公堂,把欠租的农民带上枷锁,“百般拷打”。为了偿付这无穷无尽的租债,许多农民被迫卖掉自己的亲身儿女,在那卖身契上总是写着“世世为奴”、“若不受训,听凭打死勿论”这样血淋淋的字句。当雇工、当佃户,还是没法活,贫苦农民只得扶老携幼,背井离乡,四出逃亡,成为风餐露宿的流民。早在乾隆中期,象这样无家可归的流民就达到了几百万。1796年(嘉庆元年),北京一地有十万名乞丐,2月^①的一个寒夜被冻死的就有八千人之多!

千百成群的流民辗转流徙,历尽千辛万苦,有许多便进入了南、巴老林,他们一心希望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在这里安居乐业,摆脱地主、官府的苛索勒逼。可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在那吃人的旧社会,哪里有

① 本书年分用公元纪年,月分、日期均取旧历。

穷人的活路?! 他们住在极简陋的茅草棚里,被称作“棚民”,几十家棚民租种地主的“荒地一段”,还要交纳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地租,不足糊口,只好再到木厂、盐厂、铁厂、纸厂、煤厂、香菌厂里去做工,受到地主、商人的双重压迫和剥削。他们终年吃的多半是糠菜,干的却是牛马活。如木厂的负运工人,必须在陡峭的山间背着二三百斤重的大木枋(方柱形木材),日行四十里,不让住客店,吃的是自带的干粮,晚上就睡在山洞或丛林里。厂主叫他们为“骡子”,其实他们比骡子还要苦!盐厂的雇工必须背盐二百四十斤,特制的背兜高出肩膀一大截,重心很高。他们在悬崖峭壁间穿行,稍不小心,就会跌入万丈深渊,粉身碎骨。每逢歉收粮贵的年头,万恶的厂主还要立即停业,解雇工人;在官府的庇护纵容下,流氓地痞、衙役兵丁更乘机“无风生浪”,敲诈勒索。所以,南、巴老林里的棚民仍然过着痛苦不堪、“今年在此,明年在彼,甚至一岁之中,迁徙数处”的极不安定的生活。老林地区成为一座随时都有可能爆发的活火山。

至于那些仍旧挣扎在故乡的农民,在乾隆末年,又连遭天灾,更是苦不堪言了。湖北荆州(今湖北江陵)人民被洪水淹死无数,当阳人民连树皮都吃光了,枝江、长阳人民只能吃到观音土,枣阳人民甚至以石粉充

饥;四川重庆、忠州(今四川忠县)一带则到处都可以看到饿殍〔piǎo 饿死的人〕载道的惨象。

“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灾难超乎寻常的加剧”^①是革命形势的主要特征之一。在腐朽的封建制度造成的天灾人祸下,一场声势浩大的、以白莲教形式发动的农民大起义,终于在当时阶级矛盾极其尖锐的川、陕、楚的边界地区爆发了!

二 白莲教组织的川、陕、楚大起义

(一) 白莲教的一般概况

白莲教是唐、宋以来民间组织的一种宗教结社,教义内容是明^②、道、佛三教的混合物,杂拜各种鬼神。在元、明两代,白莲教曾多次组织过农民起义,流传到清初,又发展成为反清的秘密组织。

在封建社会里,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和生产水平的低下,人们不可能完全正确地理解自然和社会现象;

^①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卷,第620页。

^② 是一种从外国传来的摩尼教演变而成的宗教,尊张角(东汉末黄巾起义的领袖,太平道教的教主)为教祖,敬摩尼(波斯人,摩尼教的创始人)为光明之神,崇拜日月,其教义主要是认为光明力量终将战胜黑暗力量。

再加上封建统治者有意地借助神权来进行欺骗统治，所以当时的许多农民相信宗教、有迷信思想是不奇怪的。剥削阶级千方百计地利用宗教来作为愚弄人民、巩固统治的工具。可是，革命的人民并没有被宗教本身大肆宣扬的因果报应^①、阶级调和等谬论所束缚，相反，他们往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利用宗教的组织形式和原始教义中的某些内容，来作为向封建统治阶级进行斗争的工具。白莲教就是这样，它的经卷中尽管充斥了许多封建迷信的糟粕，但是，革命群众常常根据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在经卷中加入了一些富有革命造反精神的斗争口号，有力地否定了儒家编造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那套鬼话。如元末白莲教组织红巾军起义时，就曾针对剥削阶级鼓吹“中庸之道”、阶级调和、“民”富“国”强的太平观，提出了“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的革命的太平观，被封建统治者视为“悖〔bèi 背〕逆之词”。到了清代中叶，白莲教更提出“红阳劫尽，白阳当兴”^②、“清朝已尽”、“日月复来属大明”（“复明”是借口，“反清”是目的）的

^① 宗教宣扬劳动人民因为前世没有修好事，所以现在受苦受难，这是罪有应得，命中注定的；只有安分守己，逆来顺受，来世才能投生到富贵人家或进入西天极乐世界。这完全是反对人民革命的一派胡说。

^② 白莲教指“红阳”为现在，“白阳”为未来。“劫”是阶段、时期的意思。

战斗口号。这种说法虽然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却鼓舞人心。它坚持光明，反对黑暗，坚持前进，反对倒退，立足于斗，否认了黑暗现实的永恒不变，肯定了光明的未来一定到来。这就很能被痛恨清朝反动统治、迫切要求改变现状的贫苦人民所接受。同时，白莲教还信奉“同教人都生于天宫”，都是“无生老母”^①的儿女，不分男女老幼，都应一律平等，要同生死、共患难，“不持一钱可以周行天下”。还主张入教以后，共同享受钱财，“教中所获资财，悉（都）以均分”。斯大林指出：“平均主义的根源是个体农民的思想方式，是平分一切财富的心理，是原始的农民‘共产主义’的心理。”^②所以，白莲教宣传的这种“平等”、“平均”的理想社会，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决不可能实现，但仍是处于小生产者地位的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所向往的，特别对于在清朝统治者残酷剥削和压迫下漂泊无定的流民来说，更是一种幸福的憧憬〔chōng jǐng 充景，向往〕，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白莲教又通过给穷人治病、传授拳艺等方式来扩大影响，并常常把经文编成歌词，配上民间小调，击渔鼓，打竹板，用说唱的形式来进行传教。正是

^① 白莲教信奉的一种神。

^② 《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3卷，第105页。

由于白莲教具备了以上特点,所以,它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得到广泛流传,终于成为劳动人民积聚革命力量、反抗清朝统治的一种组织形式。

(二) 川、陕、楚大起义的导火线

集历代王朝反革命统治经验之大成的清朝政府,早在1646年就下令取缔白莲教,督责地方政府如遇教徒,要立即“严捕,处以重罪”。但是,白莲教仍在民间秘密流传。以后,清朝统治者曾多次血腥镇压过白莲教组织的农民暴动。

1775年,清朝政府把白莲教首刘松捕送甘肃充军,进一步对白莲教进行大规模的镇压。但是白莲教并没有停止活动。刘松的弟子刘之协、宋之清等继续在湖北、四川、河南一带(主要是南、巴老林地区)传教,组织反清斗争。1793年,刘之协等又推王发生为领袖,把他说成是明朝皇帝的后代,以此作为号召,发动人民起义。不幸秘密泄露,清统治者杀害了宋之清,并把王发生发配到新疆。同时,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搜捕、大屠杀。乾隆皇帝命令各地官员要把白莲教徒“根除净尽”、“勿使漏网”。不少白莲教首,如齐林、樊学明、谢添绣等以及已被充军到甘肃的刘松,都惨遭杀害。旧恨未消,又添新仇,这就更加激起了白莲教广大教徒的

满腔怒火。

那些贪得无厌的各级官吏,又借搜捕教徒为名,大肆敲诈勒索。他们挨户搜查,“不论习教不习教,但论给钱不给钱”,就是说,不是教徒的,也得给钱;不给钱或者给少了,就要按信奉“邪教”论处。达州(今四川达县)知州^①戴如煌,为了乘机大捞一把,私设的衙役竟达五千名之多。武昌府(今湖北武汉)同知^②常丹葵,任意敲诈迫害村民,连累无辜数千人。1795年,他又到湖北荆州、宜昌地区去巡捕,稍得“证据”,立即施以酷刑,用铁锤猛烈砸击农民,甚至用铁钉把农民钉在壁上。“嫌疑”分子也要被押到省城去,每只船上装一二百人,有的人因饥寒而死,尸体就被扔进江里;至于因被严刑拷打,死于狱中的,更是不计其数。这样,清王朝对白莲教的镇压,实际上已变成对广大群众的大屠杀了。

“抽刀断水水更流”,清王朝的残酷迫害,不仅使白莲教广大教徒义愤填胸,而且也激起了各省人民的强烈反抗。一场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终于来临了!

^① 清代,州分两种。直隶州相当府一级,散州相当县一级。一州的最高行政长官称“知州”。

^② 清代,一府的行政长官叫知府,副职叫同知。

(三) 烈火燃烧

1793年,刘之协被捕后,在押送途中逃脱。他隐居在河南新野县的教徒家中,来往于汝州(今河南临汝)、邓州(今河南邓县)之间,同各地的白莲教领袖秘密联系。1795年,他又亲自去襄阳同姚之富(齐林的徒弟)等直接谋划;还通过渔夫李某跟四川达州的徐天德取得联系,约定明年3月10日同时起义。

但是,由于清朝政府对白莲教徒的搜捕日益凶暴;加上清廷为了镇压当时在湖南、贵州边境爆发的苗民起义,更加紧了对起义邻近各省,特别是对湖北省的横征暴敛。所以,湖北宜都、枝江两县人民,在张正谟等的率领下,于1796年正月首先举起了白莲教起义的大旗,给了层层紧逼的清朝统治者一个针锋相对、措手不及的打击。接着,长乐(今五峰)、长阳等地人民,也揭竿而起了。

由于长期的组织工作,白莲教徒遍布于各阶层人民之中,当阳县衙门里的衙役也早就同起义军有了联络,可是当阳县令还蒙在鼓里。当他听说邻近各县都已发生民变后,便立即升堂,命令县役们赶快严捕本县教徒。没想到县役们却齐声答道:“我们都是白莲教,去抓谁呢?”县令一听大怒,拍桌骂道:“你们反啦?!”大

家更慢声慢气地回答:“反就反嘛,发什么火啊!”这个昏愤的县令到这时候才算明白过来,站起来就想跑。可是已经晚了,县役们一拥而上,将他拿住,押出县衙门,还勒令他左手拿钱一串,右手抓银一锭,游街示众,最后把他杀了,革命群众胜利地占领了县城。与此同时,湖北远安、来凤等县的人民也都纷纷起兵响应。

秦岭山脉东延到河南西部同湖北西北部的交界处,到伏牛山陡然中断,它同湖北、安徽、河南东部交界处的大别山、桐柏山之间,有着一小块平原,这就是有名的“南(阳)、襄(阳)隘道”。白莲教早就在这里的苦大仇深的农民中间扎下了根。1796年2月,齐王氏、姚之富、王廷诏等在这里领导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起义。

在湖北人民首先擂起的隆隆战鼓声中,四川人民也举起了反抗的大旗。

1796年9月,徐天德在达州带领白莲教徒们杀了清朝的官吏,正式宣布起义。远近人民纷纷赶来参加,国鲁子^①的群众也踊跃投奔起义军的队伍。这样,达州起义军在十天之内就发展到了一万多人。

几乎与徐天德领导达州人民起义的同时,东乡(今

^① 国鲁子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四川人民的武装斗争组织。它的基本群众是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者转变而成的游民无产者。十八世纪中叶,清政府对四川大小金川用兵,初不利,许多逃亡的官兵和乡勇,也成了国鲁子的成员。

四川宣汉)人民在冷天祿等领导下也发动了起义,从湖北涌来的大批流民加入了起义军,因此声势更盛,很快就超过了一万人。

随后,巴州(今四川巴中)的罗其清、苟文明,通江的冉文俦〔chóu仇〕、冉天元,太平(今四川万源)的龙绍周、徐万富,大宁(今四川巫溪)的陈崇德等,都相继领导当地人民接踵而起。

在湖北、四川两省人民大起义的影响下,陕西省安康县的冯得仕、林开泰、王可秀等,也纷纷起于山野之中。

三省人民的起义,势如暴风骤雨,使得清朝统治者防不胜防;熊熊的革命烈火,很快就连成一片,燃遍了南、巴老林。

(四) 所向披靡

“……所谓宗教战争也根本是为着十分明确的物质的阶级利益而进行的。”^①白莲教起义虽然披着宗教的外衣,但本质上是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统治的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因此,白莲教起义一爆发,就得到各地劳动人民的积极响应;而清朝统治者则不但

^①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卷,第400页。

立即调动了全国兵力进行疯狂的镇压,而且乾隆皇帝还在宫里大念所谓“西域秘咒”,妄想咒死远在千里之外的白莲教的首领们。这在今天看来,当然十分愚蠢可笑,但倒也充分暴露了封建统治者对农民造反的无比恐惧和刻骨仇恨。

然而,清朝统治者的屠杀和诅咒,都挽救不了它从此衰亡的命运。白莲教的各支起义军,无不象那奔腾咆哮的汉水、长江,滚滚向前,猛烈冲击着清王朝的腐朽统治。

在湖北战场上,各支起义军此呼彼应,互相声援,频频出击,战果辉煌。齐王氏率领的襄阳起义军自起兵后,就曾屡次猛攻汉水边上的重镇襄阳和樊城,又转战于河南的邓州、唐州(今唐河)之间,并火烧吕堰驿,声威大振,成了四方起义军的中心。

清朝统治者把襄阳起义军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他们认为只要把这支“最为猖獗”的起义部队消灭掉,其他的农民军就可以不攻自破了。所以立即从内库拨出白银二百万两专供湖北军需,又急调山东、山西、河北、陕西、广西等省的军队入鄂,并“赦免”了流放在湖南、湖北、河南的偷马罪犯作为骑兵助“剿”队,以后又从湖南调来二万名苗兵,配合湖北原有的军队对襄阳起义军发动了大规模的重点“围剿”。

形势是严重的。但是，襄阳起义军并没有被敌人的来势汹汹所吓倒。他们在湖北各支起义军的声援、配合下，依靠人民群众，粉碎了清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5月，他们又突出敌人的包围圈，兵锋直逼孝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入离汉阳只有一百来里的地方，“三楚震动”，吓得清朝政府赶快宣布武昌（湖北的省城）“戒严”。6月，襄阳起义军又在孝感附近设下埋伏，当场击毙敌参将^①傅成朋。以后，这支部队逐渐发展到四五万人，来回转战于湖北的中部和北部地区。11月，齐王氏又率领大军渡过刘家河，进逼谷城、光化，还把河南巡抚景安包围在魏家集（今湖北同河南的交界处），打得敌人狼狈不堪。在起义军的调动下，半年多来，清军东突西窜，疲于奔命，一举歼灭襄阳起义军的企图成了泡影。

就在襄阳起义军节节胜利的凯歌声中，传来了四川达州、东乡白莲教起义胜利的信息。为了同四川省的起义军会合一起并肩战斗；也为了避开敌人在湖北集中的优势兵力，齐王氏、姚之富决定率领襄阳起义军作挺进四川的战略转移。

1797年初，襄阳起义军兵分三路乘虚攻入河南，再经陕西向四川进发。北路由王廷诏率领，攻下河南

^① 清代绿营的统兵官，位次于副将，正三品。

叶县的保安驿，围清军于裕州（今河南方城）。西路由李全率领，从河南的信阳出发，折向湖北后再次攻入河南，沿豫、楚边境一直打进陕西，直下南山老林中的镇安。齐王氏、姚之富亲率中路大军，从河南的南阳出发，北进嵩县，旋即回军南下到达陕、楚边境，攻入湖北的郧西，再折入陕西，同北路、西路两支大军会师于镇安。

为了迅速同四川起义军会合，襄阳起义军马不停蹄，从镇安经汉阴、石泉，迅速攻到汉水北岸的紫阳白马石。

在此以前，嘉庆皇帝曾一再命令他的走狗们全力加强汉水防御，以便把起义军堵在汉北聚而歼之。然而，起义军轻装前进，如流水疾风，早在清军赶到汉水边的五天以前，就在当地渔民的帮助下，夺得船只，全部渡过了汉水。接着，他们又分兵据险，且战且走，大踏步地开进了四川。1797年5月，襄阳起义军终于胜利结束了这纵横五个省区的千里长征，来到东乡附近。

在四川战场上，达州、东乡起义一爆发，清朝政府就派四川总督英善亲往镇压。英善率领重兵进驻达州城内，派游击^①尚维岳等率兵二千驻扎在达州城外的娘娘庙，又派都司^②清福进驻东乡的天星桥以作呼应，

^① 清代绿营中位次于参将的军官，从三品。

^② 清代绿营中位次于游击的军官，正四品。

成犄[ǐ 机]角之势。他们妄图堵死达州起义军的出路、切断东乡起义军的援兵，从而可以一举围歼达州起义军。可是徐天德识破了敌人的阴谋，立即采取果断行动，带领起义军出走麻柳场，预先分兵迎击清福，同时亲率主力夜袭娘娘庙。起义军士气旺盛，旗开得胜，一下子就把各处的清军杀得落花流水，尙维岳、清福等将领当场毙命。

达州起义军就这样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接着又多次沉重地打击了各地地主武装的负隅顽抗，势力急速地发展到了太平、新宁（今开江）、东乡一带。

然而，敌人是不甘心的。1796年11月，英善又派重庆总兵^①袁国璜领着川军和新从湖南调来的军队来到东乡，直逼徐天德的大营。起义军乘敌人的营盘还没有扎好，便发起猛烈进攻，打得清军三天三宿都没法合眼。后来有一支陕西的官兵调来了，也同样被打得不敢动弹。敌人只好合兵一处，躲进老营湾里，利用周围的大树作柱，编上竹竿竹条，捆上生牛皮当“墙”，“墙”外又挖了长长的壕沟，埋上铁棱[léng]。他们整天龟缩在“墙”内还不放心，每当黎明、黄昏之际，还要派一百个士兵出来吆喝三声，放鸟枪三遍，给自己壮壮胆。愚

^① 清代绿营中的正二品军官，又称总镇。

蠢而又怯懦的敌人以为这样就可以平安无事了，万万没想到机智勇敢的起义军，早已作好了歼灭他们的准备。一个大雾的天气，敌人巡逻兵照例吆喝来了，还没有等他们喊完，埋伏在壕沟边的起义军就突然跃起，向敌营内扔进千万个流星般的火球，顿时冒起了浓烟烈火。同时，起义军又用长绳、飞钩把那牛皮“墙”迅速勾倒，填得壕沟如同平桥一般，万余名战士乘势扑入，杀声震闻数十里，袁国璜等全部被歼。

不久，东乡起义军的冷天祿部前来跟达州起义军会合，掀起了四川白莲教起义的新高潮，各地人民纷纷乘胜而起，清军望风披靡[mǐ 米]。大年三十夜，徐天德和冷天祿率领起义军主力一举攻下了东乡县城。

1797年上半年，清朝政府又派陕甘总督宜绵入川进行镇压，同样无济于事。

这年5月，正当徐天德率领的达州起义军在东乡附近的白秀山遭到清军和地主武装疯狂围攻的时候，刚刚转移到四川的襄阳起义军在齐王氏的率领下，及时赶到了。他们分成黄、白、蓝三队，步兵在前，骑兵在后，突然出现在山沟，向清军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山上的达州起义军得到兄弟起义军的支援，士气倍增，也更顽强地向清军进行反击。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终于击退了敌人。湖北、四川起义军中的两支主力军

胜利会师了！他们分别屯扎在山冈之上，浩浩荡荡的队伍绵延三十多里，蔚为壮观。

东乡会师后，各地的起义军加强了联系，他们把各支队伍按地区统一分编为黄、蓝、青、白等号（如“襄阳黄号”、“襄阳蓝号”、“达州青号”、“东乡白号”等），并在军中设置掌柜、元帅、先锋、总兵等组织领导，各号中再分设若干战斗单位——营（如齐家营、高家营、冉家营、魏家营等），以便于更灵活地进行战斗。此外，起义军还不断派人到川东、川北各地去发动群众、扩大队伍。沿途人民纷纷响应：6月，云阳的林亮功等占据了白岩山，称“月蓝号”；奉节的龚文玉等称“线号”，占据铁瓦寺。与此同时，“巴州白号”罗其清部则攻入巴州城，杀死了凶悍的地主武装头子李遇春。到年底，起义军已经控制了巴州、达州、东乡、太平、通江、广安、邻水、长寿、奉节、云阳、巫山、开县、广元、昭化等二十余州县的广大农村地区。

1798年初，“东乡白号”起义军在冷天祿的率领下，出奇制胜，顺利地占领了在开县西南六十里、拥有几千家商号的临江市。各支起义军（除齐王氏一支的一部分外）闻讯后纷纷赶来聚会，在这里载歌载舞，欢度除夕，庆祝起义以来所取得的巨大胜利。历来遭受官僚豪绅凌辱迫害的演员们，这时也高兴地为起义军演



东乡会师

出了歌舞戏文。临江市里寒梅怒放,鞭炮齐鸣,充满了一片欢欣鼓舞、喜迎新春的吉庆景象。

东乡会师和临江聚会,是一年多来广大革命群众英勇奋战、在战斗中不断成熟的结果,它不仅是一次对各部起义军力量的大检阅、大整顿,而且也是一次对清朝反动统治者的大示威。它表明了革命形势的一片大好,显示了起义军的巨大力量,体现了革命农民之间的战斗团结,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三省人民起义的进一步发展。

川、陕、楚三省白莲教起义一经爆发,就接连重创敌人,得到迅速发展,决不是偶然的。老林地区数千里崇山峻岭,层峦叠嶂,处处有险可守,有路可通;这里地处三省边界,犬牙交错,各地官府鞭长莫及,所以是历代封建王朝统治链条中比较薄弱的环节;明代中叶的刘千斤和明末的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都曾在这一带活跃过,这里的人民受过革命的熏陶,有着光荣的斗争传统。所有这些因素,都给白莲教起义取得节节胜利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起义本身所具有的正义性和群众性,而“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①起义军代表了被压迫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作战英勇,纪律严明,戒

^① 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478页。

贪、戒杀(不杀人民)、戒淫。这样,它就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就能在同腐败的清军作战时经常立于不败之地。

(五) 人民起义的威力

清代中叶的白莲教大起义,实质上是以川、陕、楚三省人民为代表的全国人民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革命战争。襄阳起义军挺进四川时,李全率领西路军路过陕西商南县,商南人民有五六千人闻风相从。四川达州徐天德起义时,远近百姓带着全家老小加入的竟有数百家之多!起义军还未抵达巴州,巴州的人民就纷纷出城迎接;还未抵达通江,通江的老百姓就有许多跑出城去加入起义军的队伍。

起义军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人民为他们带路、安排住宿、更换骡马、补充衣食火药。因此,起义军进军时,可以不带粮食,不背行李,轻装疾走。他们充分利用林深山险的有利地形,采用不整队、不走平原、时分时合、忽南忽北、或战或走的游击战术,不时给那些专以奸淫掳掠为能事的清朝老爷兵以沉重的打击,使敌军惊恐万状,不敢迎战。

起义军转战河南,巡抚景安有四千兵,竟躲在南阳,不敢截击。陕甘总督宜绵则是“畏葸〔xǐ洗,畏惧〕

无能，巧于退避”。四川总督魁伦、陕西巡抚永保、湖北巡抚惠龄等，也都是一样的大草包，只敢远远地躲在起义军的后边跟踪。“建锐”、“火器”两营京兵奉命去追“剿”起义军，距达州仅七十里，却提心吊胆地走了两天才走到。至于地方官兵，则更是不堪一击了。四川长寿县令，还没有等起义军攻进城来，就偷偷地坐船逃跑了。起义头两年，地主武装躲在寨堡里，哪怕只见到一两个起义军战士，便马上“连村悉(都)溃”，听到起义军战士大喝一声，更立即“弃械就缚”，甚至找一根草绳套住自己的脖子，主动拴在起义军的马尾巴上甘作俘虏！

纸老虎洋相出尽，人民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他们编了许多诗歌来讽刺挖苦这些胆小如鼠的清军，如：“‘贼’来不见官兵面，‘贼’去官兵才出现。”“‘贼’至兵无影，兵来‘贼’无踪。可怜兵与‘贼’，何日得相逢！”对于清朝那些怯懦的将领，老百姓更奉送他们一个名副其实的绰号——“迎送伯”（只会为起义军迎来送往、不敢同起义军正面交锋的怕死鬼）。

白莲教起义军的所向无敌和清朝军队的腐败无能，把清朝最高统治者急得团团转。乾隆皇帝在1796年就逊位^①了，但仍旧异常“心焦”；嘉庆皇帝一“登基”

^① 乾隆当了五十年皇帝，于1796年初让位给皇太子（即嘉庆帝），自称太上皇。

就“寝食不宁”。他们不断地撤换统帅：永保不行，就换上惠龄；惠龄不灵，又换上宜绵；宜绵连吃败仗，再换上勒保。撤换之外，还宣布把一些实在不挣气的走狗“逮京问罪”。嘉庆皇帝写过一首所谓《述忧诗二十韵》，其中有几句：“……改元^①兴教匪，由楚及陕川。……徒劳兵勇力，疲于奔命焉！”不打自招地活画出清朝统治者当时的那副狼狈相。

（六）坚贞不屈的女英雄

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指出：“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②川、陕、楚白莲教起义杰出的女领袖齐王氏便是其中的一个。

齐王氏是湖北襄阳人，从小跟随老父流浪街头，走马卖艺，耳闻目睹了当时的种种黑暗现状，受尽了官府、地痞的侮辱、蹂躏[róulin柔吝]和迫害。在艰难的环境里，她练就了一身好武艺。结婚以后，在丈夫齐林和白莲教徒们的影响下，她又扩大了眼界，树立了推翻黑

^① 改年号。川、陕、楚白莲教大起义正是在嘉庆皇帝刚即位的那一年(1796年)爆发的。

^②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586页。

暗统治、争取幸福生活的雄心大志。不久,反动的清朝统治者,夺去了她丈夫和白莲教大批教首、教徒的生命,更激起了她对清王朝的无比仇恨。齐林牺牲以后,她便回到娘家,跟齐林的徒弟姚之富、大侄王廷诏等共同策划起义。1796年2月,年仅二十岁的齐王氏剪去长发,穿着一身白衣,执鞭跨马,投入了人民大起义的滚滚洪流。由于她具有对清朝统治者的强烈仇恨和出众的武艺,也由于广大教徒对齐林烈士的尊重和怀念,所以她立即获得起义人民的热烈拥护,被推立为白莲教的“总教师”。

齐王氏率领襄阳起义军连挫敌军,并完成了从湖北经陕西到四川的战略大转移,威望日高。这样,她就更为清朝政府注意了。东乡大会师后,襄阳起义军的大队主力驻扎在开县的南天洞一带,各路清军也就随即跟踪而来,集中了优势兵力,妄图三面合击,把齐王氏部一举歼灭。为了避免在不利情况下的决战,齐王氏便留下李全一部,跟四川的友军联合行动;自己则亲率大军向东转移。起义军在夔[kuí 奎]州(今四川奉节)附近兵分两路,一路由王廷诏率领挺进湖北,从远安、当阳进取荆州;一路由齐王氏亲自指挥,取道夔州,在白帝城同清军激战了三昼夜。齐王氏同战士们一起,手持盾牌,“燃炬夜攻,更番迭战”,杀得清军连喘息的

机会都没有,从而突破了敌人的防线。7月,齐王氏部进入湖北的巴东、归州(今秭[zi]子)归一带,随即杀向兴山、保康、南漳,转而又折向东南,由宜城、钟祥直奔襄、樊而来。面对起义军的凌厉攻势,清政府慌忙下令“汉江戒严”。由于敌人在荆、襄一带预先设置了重兵,构筑了工事,所以起义军毅然决定放弃攻占城市的计划,齐、王两路重新会合,依然采取避实击虚的战术,向西迂回至房县、竹山地区,并在郧西境内大败清军,杀死了护军统领惠伦等将领,然后进入陕西。9月,李全部也转移到陕西,同齐王氏会师于兴安(今安康)。11月,“襄阳黄号”、“襄阳白号”、“襄阳蓝号”各支队伍又会合在一起,翻越险峻的大巴山,连营二十余里,转战在川、陕边界,后来再次进入四川境内。几个月来,敌人处处被动,被起义军飘忽不定的流动作战拖得疲惫不堪,嘉庆皇帝恼羞成怒,大骂齐王氏是“贼中首逆”,勒令各部清军云集汉南、川北,务必把襄阳起义军围歼于汉水之南。

齐王氏识破了敌人的阴谋,就采取调虎离山计。1798年初,她密令高均德带领一支人马出击东北方向以引诱敌人,清军果然中计,跟在高均德后面穷追不舍。齐王氏乘间挥军北上,抢渡汉水,发动了有名的汉中大捷。他们从陕西城固、洋县一带的南山老林出发,

迅速插入宝鸡、岐山附近，军分十队，马步相间，猛攻郿县（今眉县）。而李全率领的先头部队则出击周至，直逼西安。起义军闪电般的攻势，可把清朝政府吓坏了，明亮、德楞泰等部急急如丧家之狗，日夜兼程前来堵截，陕西巡抚秦承恩则踉踉跄跄地跑回西安加强防守。

不幸，李全率领的先遣部队在焦家镇、圪（gē 鸽）子村同敌总兵王文雄部激战后，遭受了重大损失。齐王氏见敌人已有准备，便当机立断，决定不取西安，而由山阳石河铺一带向东杀回湖北。这时，敌军紧追于后；前面，赛冲阿等堵住了高坝店、漫川关，明亮、德楞泰等又由黄陇铺、宽坪各处往回兜击。齐王氏下令分军三路，排列在左右两山和山下大路前抗击。起义军激战不利，准备向东北方向突围，又遭堵截。于是，只好向西南的甘沟一带退却。又经一场苦战，起义军进入湖北。这时，德楞泰、明亮等率满、汉清军和地主武装又由郧西的上津堡附近兜回，在郧阳（今郧县）县境的三岔河正好同齐王氏的部队相遇。当敌人得悉齐王氏等都在左边的卸花坡上时，又喜又恨，赶紧把卸花坡围得水泄不通。

情况万分危急。面对德楞泰、明亮、赛冲阿、阿哈保等八路强敌的围攻，齐王氏率领起义军“抵死抗拒”，弹药箭矢用完了，就滚下巨大的石头。但是，由于敌人在数量上占了压倒优势，起义军的防线终于被突破，清



豪气如虹

军团聚而上。这时，齐王氏、姚之富跳下战马，率领十多名女战士，攀登上险峻的山顶，毫不犹豫地相继跳下陡峭的悬崖，壮烈地牺牲了。这一天是1798年的3月6日，齐王氏才不过22岁。两年来，她率领襄阳起义军转战南北，机智勇敢，杀得敌人闻风丧胆，最后矢志不屈，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壮怀激烈，豪气如虹。齐王氏战斗的一生，充分体现了我国劳动妇女的智慧和胆略，也是给孔老二之流所谓“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无耻谰言的一记响亮的耳光。

（七） 扑不灭的烈焰

齐王氏、姚之富虽然牺牲了，但是革命的烈火却更加炽烈地燃烧起来。齐、姚的余部二万余人重返四川，同罗其清、冉文俦等会合。四川各部起义军成了反清斗争的主力。不久，就恢复到汉中大战前的声势。他们在川、陕、楚三省交界的南、巴老林地区频频出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清军的各路头目，不得不发出种种哀鸣：“三年来的防剿，跟理乱丝一样，越理越乱！”“教军越剿越多，新起的教军，远远超过被剿除的教军！”“我军被迫分防，兵力愈显不足，花了这么多军饷，又有什么用啊！”

但是，正如斯大林指出的：“历史上还没有过垂死

的阶级自动退出舞台的事情。”^①清朝政府调动了五万多名满汉步、骑兵，把他们集中到四川，妄图将起义军围困在川东北全部消灭。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计划，起义军各部从1798年起，便普遍展开了大规模的流动作战。

杨开甲、张士龙等打到了甘肃的南部；樊人杰、龙绍周等攻入陕西，不久又杀回四川；高均德率领的起义军从四川打到陕西东南部，再转入湖北，杀败清军主力，击毙参将董宁川等，又重返陕西；冷天祿、王光祖部，同徐天德等部忽分忽合，转战于川东北；张汉潮部则一直活跃于川陕、陕甘之间，牵制了大批清军，往返如入无人之境。各支起义军互相配合应援，打得清军首尾不能相顾；他们还采用夜战、晓战、雾战等各种形式突袭敌人，使清军昼夜不得安宁。

被敌人称为“川匪最悍者”的徐天德部，更是不断给清军以无情的打击。1798年初，徐天德曾派人到梁山（今梁平）、万县等地，联络白莲教徒郭长俊、伍一凯等起义。下半年，该部在林亮功、王光祖的配合下，在新宁（今开江）一带重创敌人，接着又挺进忠州，杀死代理州官和地主豪绅一百余人；随即打到丰都、长寿、定

^① 《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2卷，第35页。

远(今武胜),把当地的清军和地主民团打得落花流水。1799年初,这支部队又杀回长寿。清军主力一直尾追不放,千方百计想把它“吃”掉。但是徐天德不慌不忙,在迂回战中不时杀一个回马枪,打得敌人措手不及。2月,在长寿县的云台铺,徐部起义军把德楞泰的清军大营围攻了整整一夜;次日,又同前来营救德部的额勒登保、赛冲阿的马队酣战了一天。接着,起义军突至平井铺,把几股清军远远地甩在后边。平井铺,是一个热闹的市镇,有一百多家商店。为了更多地消灭敌人,徐天德就让起义军中的女战士,扮成饭铺、酒店的老板娘,准备下了酒肴〔yáo姚〕茶饭。等到清军前锋尾追而来,争吃抢喝的时候,埋伏在四周的起义军一声呼喊,挥刀跃出,把这些愚蠢的家伙全都结果了。起义军就是这样依靠自己的机智勇敢,屡次粉碎清军的围追堵截,于这年的下半年,转移到了湖北境内。嘉庆皇帝的“围歼”计划又破产了,只好再下令把他的五省“剿匪”总司令勒保“逮京问罪”。

起义军的另一支主力部队,在罗其清、冉文俦的领导下,也纵横驰骋,穿州破县,使清军束手无策。1798年夏秋之际,他们又在营山县的箕山建立起粮草充足的大本营,并不断派兵分扰营山、仪陇、巴州等县,抄袭清军,截夺粮草。后来箕山不幸失守,起义军又转移到

大鹏山,那大鹏山更是素称“天险”,广袤百里:西北有观紫山、龙台山扼守,东北有最高的双山子护卫,东南的郑家山逶迤连绵,同大鹏山只隔着一道山峪,峪中的宝珠寺里又堆积着大批粮食。起义军在各险隘处还筑起了坚固的木栅石墙,真是一个进可取、退可守的好处所!清朝将领额勒登保、德楞泰、惠龄、恒瑞率领重兵,四面围攻,使尽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无可奈何,起义军的大旗依然在大鹏山上高高飘扬。

(八) 惊心动魄的战斗

面对如火如荼〔tú途〕的农民革命,清朝皇帝又急又恨,大骂领兵诸将“防剿不力”,是“不忠之臣”,严厉督责他们全力以赴,不仅要生擒“首逆”,而且要全歼“贼众”。于是清军向革命人民发起了疯狂反扑。1798年年底,在四路清军和地主乡勇的联合进攻下,四川起义军的大鹏寨在坚守了三个月以后被攻破了,起义军的首领罗其清被俘,英勇就义;冉文俦转移到通江后,也在一次突围的战斗中壮烈牺牲。损失是惨重的,但是各地的起义军并没有气馁,他们英勇顽强,继续奋战,忽东忽西,时聚时散,同敌人周旋在川、陕、楚、豫、甘五省辽阔的大地上,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

苍溪之战

冉文俦阵亡后，他的侄子冉天元便接过战旗，率领起义军东征东乡、北击太平。1799年9月，在关口坪大战清军之后，这支起义军就进入了巴山老林。接着，冉天元又统率全军，向西挺进到苍溪境内。

11月，清军主帅额勒登保尾随而来，将冉天元部围困在苍溪县的人头山上，并命令杨遇春、穆克登布等率精锐分成三面向山上的起义军发起猛攻，妄图把冉天元部一网打尽。面对强敌，年轻的冉天元毫不畏怯，他从容地组织力量，指挥起义军居高临下，全力进攻额勒登保的中营，同敌人展开短兵相接的激烈搏斗，把阵前的清军杀得血肉横飞。夜幕降临了，起义军又从山上扔下千万支火炬，把敌营上空照得如同白昼一样，接着就用强弓发射利箭，一整夜只听见“嗖嗖”的箭声不绝。这一仗，起义军杀死了二十四名清军副将^①以下的军官，而自己则借黎明前夜色的掩护，突破了敌人的重围，挺进到巴州的阴背场。额勒登保遭此大败，诚惶诚恐，赶快向清朝皇帝连连“请罪”。

就在这一年，“太上皇”乾隆被白莲教起义军的节节胜利连气带吓，一命呜呼了。他在断气以前，还握着嘉庆皇帝的手，“频望西南”，“遗恨”无穷哩！这不仅

^① 总兵下一级的高级军官，从二品。

说明了封建帝王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动阶级本性，而且也充分暴露了封建统治者在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下的虚弱无能。

高院场之战

1800年初，冉天元、张子聪、陈得俸、徐万富、赵麻花五部起义军，在粉碎了各路敌军的“围剿”之后，合兵一处。这支数万人的大军，从合州出发，转向定远，于1月15日的晚上抵达嘉陵江边的石板沱。这时候，石板沱西岸的清朝守军一个个都溜到剧场去了，在那儿狂欢作乐“庆元夕”，欣赏“演春灯”，哪里想到起义军的前哨部队已经夺船过江，突然出现在剧场，战士们一声大呼，把敌人吓得魂飞魄散，四处逃窜。接着，起义军的大队人马便顺利地渡过了嘉陵江。远近的人民纷纷赶来加入，队伍很快发展到了十多万人。起义军以闪电般的速度向西突进，四天后抵达蓬溪县境的高院场。

清总兵朱射斗闻讯后立即赶来，用大炮轰击起义军。起义军早就恨透了这个被敌人视为“骁勇敢战，屡立功勋”的刽子手，现在正是为千万阶级兄弟报仇雪恨的大好机会，于是广大战士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匍匐前进，一直杀到朱射斗的指挥帐前，把他团团包围。朱射斗一看大势不好，慌忙准备逃命，早被起义军手起刀

落,斩于帐下。他所率领的一千多名兵丁,也被起义军歼灭无遗。

高院场之战,是一场出色的歼灭战。它使清朝官兵“无不丧气”胆寒,充分显示了革命农民的英勇无畏和起义军联合作战的巨大威力。

智渡潼河,猛插川西

为了彻底粉碎敌人对于四川东北部各支起义军的“围剿”,同时,也为了接应由甘肃一带杀回四川的各支起义军,高院场战役后,冉天元部北上梓潼、江油一带,进击川西清军;张子聪部则直逼成都而来。

1800年3月的一天深夜,张子聪率领部队已挺进到射洪县的潼河(今梓潼河)渡口太和镇的东岸了。当地的清朝守军,同样想不到起义军会插翅飞来,他们还在打牌。呼么[yaō 腰]喝六地狂叫着。起义军为了迷惑敌人、迅速过河,就先派了几名战士扮成过路客商同他们一起打牌。贪婪的清军赢光了“客商”的铜钱还不过瘾,还想把“客商”身上带的银子也赢到手。牌越打越来劲;大队的起义军,也越来越多地渡过了河。等到万余名起义军差不多全部渡过了潼河,这些“客商”便拔出雪亮的大刀说:“就拿这个家伙作赌注吧!”吓得清军目瞪口呆,只好乖乖地当了俘虏。



智渡潼河

作风和誓死无退的顽强斗志，却充分显示了革命人民不怕苦、不怕死的宝贵精神，使敌人不寒而栗，使广大群众倍受鼓舞。

（九）艰苦卓绝的斗争

川、陕、楚白莲教大起义，从1796年爆发起，到1798年初的汉中大战，为第一阶段，以襄阳起义军为中心，矛头所向，势如破竹，清军屡换统帅，还是“一筹莫展”。从齐、姚牺牲到1800年初，为第二阶段，以四川起义军为主流。这时，清朝统治者开始起用汉族地主将领（如杨遇春、杨芳之流）和利用汉族地主武装（如罗思举、桂涵之流）；开始实行寨堡政策，坚壁清野，层层进逼；并任命镇压过苗民起义的大刽子手额勒登保、德楞泰为统帅。但是这些政策还没有能立即奏效，所以起义军采取大规模流动作战的方式，仍然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声势很盛。尽管中间有过几次挫折，但从总的战局来看，革命形势还是高涨的、发展的。但是从1800年夏天开始，战争形势就发生了重大变化，白莲教起义转入低潮，其主要原因是敌人恶毒的“坚壁清野”、“筑寨团练”的政策逐渐产生了显著影响。

毛主席深刻地指出：“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

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①，“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②。清代中叶的白莲教大起义，不但搅动了满族贵族、汉族官吏的酣梦，而且也直接打击了由它们所代表的汉族大地主的切身利益。因此，汉族地主乡绅，也同样如丧考妣（父母），自动组织起反革命武装——乡勇和团勇，积极投身于镇压农民起义军的行列，帮助清军守城和进攻起义军。1797年，仅四川一省的乡勇就有三十万人之多。同年，襄阳地主梁有谷等开始“筑堡团守”。过了两年，合州知州龚景翰，又提出了“坚壁清野”的毒计，妄图分割起义军同广大人民的联系，断绝起义军的粮源、兵源，进而围困起义军。他针对清朝正规军腐败无能、起义军锐不可挡的情况，主张把小村的人民强行集中到大村，把平原地区的人民强行迁徙到有险可守的地区。再在这些寨堡的周围，挖上深沟，垒起高墙，里面集中粮食、牲畜和武器。还分派官吏组织团练兵丁清查户口，严防人民逃跑，并抗击前来进攻的起义军。他认为这样一来，就可以使起义军“进不得战，退无所食，不过旬余，非溃即死”。这个反动透顶的建议，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588页。

^②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15页。

得到了清朝最高统治者的欣赏和重视，被认为是对付起义军的“良策”。于是，寨堡政策便先行于川东、川北，随后又普遍推广到陕西、甘肃、湖北各省。

由于汉族地主阶级急于保护自己的“家室田园”，也由于他们对于本乡本土情况熟悉，所以地主武装在“围剿”起义军的过程中，起到了清朝正规军所难以起到的作用。在前面提到过的大鹏寨、马蹄冈战役中，起义军都主要是吃了地主武装的亏。在清朝最高统治者进一步号召各军“保奏”封赏汉族地主武装头目之后，这些反革命分子就更加卖命了。1800年，嘉庆皇帝又下令“限期半年”把各地寨堡全都“修筑告竣〔jùn 竣，完毕〕”。下半年，各省的地主寨堡到处林立，起义军的活动条件就变得极其艰苦了。

但是，“中国人民是勇敢的”^①。在反动势力布下的重重困难面前，起义军没有丝毫的畏惧和动摇，相反，却更加英勇顽强地继续斗争着。

1800年，襄阳起义军的余部在高二、马五的领导下，在竹子山大败清军，杀死清朝总兵施缙。以后，他们又同张士龙部合兵于甘肃秦州（今天水），在徽县伏家镇夜袭清军，杀死清军将领十七名，歼灭清兵一千

^① 毛泽东：《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1251页。

多，前四川将军^①富成也被击毙。接着，又转向陕西西乡县，在法宝山大败清军，杀死了提督^②王文雄及副将鲍贵等。王文雄这个家伙，曾经在齐王氏向西安进军的时候，拼命抵挡和残忍屠杀过起义军，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所以这一次，起义军战士凝聚了千仇万恨，砍断了他的左臂，并在他的心腹要害处直戳了十几枪。真是大快人心！

徐天德部自1797年下半年挺进湖北后，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斗争。尽管条件已经非常艰苦，他们仍然活跃在川、楚边界，牵制了大股清军。1800年，他们在湖北南漳县的马家营大败敌人，杀死清朝的总兵王凯。1801年，他们又曾攻打竹溪县城，击毙清朝的千总吴瑜恩。同年夏，徐天德在陕西西乡县渡河时不幸溺死，他的弟弟徐天寿、徐天培又率领起义军继续斗争。

1802年底，在清军和地主乡勇的联合进攻下，起义军虽然只剩下一万多人了，但他们的战斗意志仍然没有稍减。这年2月，“襄阳黄号”的老将樊人杰率部进入湖北竹溪县境，并穿越老林，直逼汉水。巡抚全保带领总兵王懋〔mào 帽〕赏等急忙驰军堵击。起义军英勇杀敌，围攻松柏寨，夺得大批军粮，随即迁往山峻路

^① 清代驻防各地的八旗军事长官。

^② 清代地方的高级军官，从一品。

险的马鬃岭。敌人又跟踪而来，分三路围抄，用“劈山炮”猛攻。形势非常紧急。但是，樊人杰临危不惧，振臂一呼，全军上下殊死苦战，终于把清军杀得大败，王懋赏等十四名将领也全部丧命。

到了1803年，起义军只剩下了一千多人，他们仍旧利用老林的有利地形，忽川忽陕，顽强奋战，使清朝统治下的“三省不得解严”。并且，在一次突袭中，起义军熊老八等还将额勒登保的得力干将、血债累累的提督穆克登布杀死了！

总之，从1800年下半年清朝政府全面实行“坚壁清野”、大力起用地主武装与清军协同作战以后，起义军又进行了四年多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直到1805年夏天，起义军的最后几位领袖都牺牲了，这场轰轰烈烈的白莲教大起义才被清朝统治者镇压下去。

（十）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川、陕、楚人民以白莲教为组织形式的革命战争虽然失败了，但是，起义军的革命斗争精神却永远铭刻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中。他们那百折不挠、前仆后继、视死如归、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将永远鼓舞革命人民团结起来，向一切反动派进行英勇的斗争。

起义一爆发，许多白莲教徒便烧掉自己的房屋，全

家参军，以表示一往无前、再不回家的坚强决心；男女老幼，转战千里，风餐露宿，昼行夜战。即使是妇女、孩子，也都“矫健若飞”，作战中同样“便捷轻锐”、勇猛“刺击”。这是何等动人的场面！

进攻时，起义军在敌人的“枪箭并发之下”，还是手执长矛“低头直扑”；防守时，他们同样“毫不畏惧，抵死不退”，身中数箭，还力战到底。这是何等豪迈的气概！

在湖北鲍家畈〔fàn 泛〕一场激烈的战斗中，起义军将领刘起荣，头缠白布，手持大旗，骑战马往来指挥。不幸左腿中箭，顿时血流如注，接着右边的肋骨上又中了一箭，刘起荣咬紧牙关，不动声色，拔出两支箭，继续驰骋在战场上，指挥如旧。这是何等顽强的斗志！

1802年5月，樊人杰等在鄂西北的马鹿坪大山同德楞泰酣战，不利。樊纵身跳入山下“水深浪大”的平口河。乡勇三人泅水扑将过来，妄图把樊人杰活捉。樊人杰立身于惊涛骇浪中，奋力搏斗，终于一起被湍流激浪淹没。这种在不利条件下宁可同敌人同归于尽也决不苟且偷生的崇高气节又是多么值得敬仰！

巴州起义军的老将苟文明曾迭挫强敌，被清政府视为“最为狡恶”者。1801年以后，在敌人的疯狂“围剿”下，他身边只剩下了三十多名战士，但仍然出没老林，坚持战斗。同年6月，他们在陕西佛坪县的花石岩

遭遇敌军袭击，起义军恃险奋力抵抗，最后弹尽粮绝，苟文明宁死不作俘虏，跳崖牺牲。类似这样的例子，在这次白莲教起义中是屡见不鲜的。起义军将领陈崇德，在太平县境的水墩子山上被清军围困，由于众寡不敌，眼看就要被敌人活捉了。这时，他便毅然挺矛戳穿自己的胸膛，英勇就义。1802年1月一个风高月黑的夜晚，开县木王山上的起义军遭到敌人的偷袭，伤亡惨重，为了不做俘虏，跳崖牺牲的更达数百人之多！

即使不幸被敌人活捉，起义军的将士也“不惧不悔，视死如归”，千方百计地同敌人斗争到底。1802年6月，有几百名起义军战士被敌人俘虏，囚禁在四川长寿县的鼓楼里。当晚，他们乘看守呼呼大睡的机会，打碎枷锁，一哄而出，联合了城内的白莲教徒，一起大闹长寿县，把那些正在梦乡中的士绅“老爷”们杀得哭爹喊妈，乱作一团。

1800年3月，起义军被围困在剑州石门寨，烈士陈得俸的妻子郭氏身穿白衣，高举着上面写有“报仇”字样的大旗，同敌人英勇搏斗，被俘后，不屈而死。

起义人民这种大无畏的凛然正气，使敌人毛骨悚然，肝胆俱裂。1801年7月，在四川广元的大毛坡之战中，一名起义军战士阵亡后，双手仍紧握长矛，作突刺状；清兵苟仲贵在山岩上见了，吓得摔了下来，正好掉

在矛头上，穿心透背而死。1802年6月，在四川秦罗坪之战中，起义军在阵前一声大呼，清军参将桂涵部下的一个走卒竟被吓死了！

尤其可贵的是，在经过长期苦战，处境日益困难的情况下，起义军还屡次撕毁敌人劝降的文告，斩掉前来诱降的清朝官员，“诛既不畏抚不降”，“绝无悔心”，誓同敌军拼刺到流尽最后一滴鲜血。

巍峨的秦岭山脉，极天的大巴山，是最好的历史见证。南、巴老林中这一个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这一件件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无不表明了中华儿女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伟大的人民！

三 结束的话

清代中叶白莲教大起义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①。白莲教起义的基本群众是山区农民、破产后的流民以及一部分手工工场的雇工，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他们不可能“对于社会历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588页。

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①。因而也就不可能自觉地认识清朝反动统治的阶级实质，进一步提出明确的斗争纲领；同时，也就不可能清醒地认识革命队伍内部成员的阶级属性和特点，并进而正确地加以引导。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两个致命的弱点：

第一、用宗教迷信来组织群众，虽然在起义的初期有着一定的号召力，但是，在革命蓬勃开展以后，起义军的领袖们，却没有能随着现实情况的发展变化而制定出新的斗争口号、斗争策略，特别是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没有夺取全国政权的远大计划，这样就不可能不断地、更广泛地动员人民投入斗争，壮大起义队伍，使革命得到持久深入的发展，取得辉煌的胜利。

第二、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和游民无产者的破坏性在革命斗争中表现出的无政府思想和军事上的流寇主义。这种无政府思想，主要表现在没有建立一个农民自己的政权，没有一个在实际上真正指挥全军统一作战的领导核心。这次起义前后共有大小几十股，首领上百个，尽管有时也互相配合，也有过少数几次大规模的联合行动，但基本上还是各自为战，没有全面的统一行动，没有周密的长期作战计划。这样，在政治上就不可能产生更广泛深刻的影响，在军事上也不能给清朝反

^①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260页。

动统治以致命的打击，反而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至于军事上的流寇主义，则表现为长期大规模的流动作战，不注意建立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在战争前期，起义军采取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得到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和支持，所以取得了主动权，清朝官员哀叹道：“贼常饱而我兵常饥，贼常逸而我兵常劳。”但当敌人普遍实行“坚壁清野”政策以后，敌我双方的主、被动地位和劳逸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起义军的战略战术却没有能及时采取相应的变化。由于没有建立保证供应的巩固的根据地，所以兵员、给养都发生了严重困难，只能长期在深山老林中东流西窜，陷于流寇主义的盲目行动，越打人数越少，形势越险恶，终于悲壮地失败了。

几十万白莲教起义战士用自己的鲜血换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虽然人数众多，斗争英勇，但是由于没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指引，单依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的。

尽管如此，这次大起义仍然同历史上一切规模较大的农民战争一样，建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

川、陕、楚白莲教起义，是清代中叶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它纵横五大省，历时九年半，沉重地打击了清朝政府从全国十六个省调来的军队，杀死副将以下的

军官四百余名,一、二品大官二十余名,土豪劣绅更不计其数(仅四川一省,就不下五六百人),这就严重地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起义军还严厉镇压了一大批满口“仁义道德”、实质疯狂仇视革命的反动儒生,用革命暴力猛烈地冲击了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孔学。清朝政府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还消耗了饷银二亿两,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它五年的财政收入。从此,清王朝就陷入了武力削弱、财政奇绌〔chù 触,不足〕的困境,迅速地跌入没落的深渊。

川、陕、楚白莲教大起义的伟大功勋还在于它有力地促进了后代人民的觉醒和斗争,推动了历史的进程。起义军在战旗上大书“官逼民变”,被俘的战士在公堂上愤怒地控诉“官逼民反”,这就充分说明了广大人民对反动统治的满腔仇恨,说明了他们认识到:不起来打倒贪官污吏,人民就永远没有翻身出头的日子。那“清朝已尽”的口号,更是表明早在清王朝的所谓“盛世”,革命人民就有了推翻它的决心和信心;这个口号对于后来的起义农民也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使他们坚信“世界必一大变”(刘之协的话),看到了黎明的曙光。事实上,白莲教起义本身就有有力地揭露了清王朝外强中干的本质。在这以前,我国各个封建王朝的中叶,爆发历时这么久、规模这么大、使统治阶级如此焦头烂额、狼

狈不堪的农民大起义,还是极少有的。这就充分说明了所谓的“乾嘉盛世”,也只不过是衰老的封建社会在总崩溃前夜的回光返照而已。

“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①清王朝及其所代表的地主阶级对广大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没有穷尽,广大人民的反抗斗争也就必然不会停止。革命烈士的斗争精神永垂不朽,仇恨的种子定要生根发芽,白莲教起义英雄的鲜血浇灌在祖国的大地上,哺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革命人民,向腐朽的清王朝发起一次又一次的猛烈冲击。时代在前进,人民更觉醒,随着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一百年以后,我国最后的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终于被人民革命的大风暴葬入了坟墓!

回顾清代中叶川、陕、楚白莲教大起义的历史,更使我们坚信:**“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②崔嵬连绵的南、巴山峰,就象一座座高耸入云的英雄纪念碑,永远闪耀着人民革命的万丈光辉。

①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289页。

②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588页。